

新闻与传播学译丛·学术前沿系列

媒介仪式

一种批判的视角

Media Rituals:
A Critical Approach

英 | 尼克·库尔德里 (Nick Couldry) 著
崔玺译

媒介仪式

一种批判的视角

Media Rituals:
A Critical Approach

英 | 尼克·库尔德里 (Nick Couldry) 著
崔玺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媒介仪式：一种批判的视角 / (英) 尼克·库尔德里著；崔玺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 10

(新闻与传播学译丛·学术前沿系列)

书名原文：Media Rituals: A Critical Approach

ISBN 978-7-300-23057-3

I. ①媒… II. ①尼… ②崔… III. ①传播媒介—研究 IV. ①G20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144774 号

新闻与传播学译丛·学术前沿系列

媒介仪式

一种批判的视角

[英] 尼克·库尔德里 著

崔 玺 译

Meijie Yishi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010-62511242 (总编室)

010-62511770 (质管部)

010-82501766 (邮购部)

010-62514148 (门市部)

010-62515195 (发行公司)

010-62515275 (盗版举报)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

规 格 170mm×240mm 16 开本

版 次 2016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张 15.25 插页 2

印 次 2016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218 000

定 价 45.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总序

在论证“新闻与传播学译丛·学术前沿系列”可行性的过程中，我们经常自问：在这样一个海量的论文数据库唾手可得的今天，从事这样的中文学术翻译工程价值何在？

祖国大陆 20 世纪 80 年代传播研究的引进，就是从施拉姆的《传播学概论》、赛弗林和坦卡德的《传播理论：起源、方法与应用》、德弗勒的《传播学通论》、温德尔和麦奎尔的《大众传播模式论》等教材的翻译开始的。当年外文资料匮乏，对外交流机会有限，学界外语水平普遍不高，这些教材是中国传播学者想象西方传播学地图的主要素材，其作用不可取代。然而今天的研究环境已经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图书馆的外文数据库、网络上的英文电子书汗牛充栋，课堂上的英文阅读材料已成为家常便饭，来中国访问和参会的学者水准越来越高，出国访学已经不再是少数学术精英的专利或福利。一句话，学术界依赖翻译了解学术动态的时代已经逐渐远去。

在这种现实面前，我们的坚持基于以下两个理由。

一是强调学术专著的不可替代性。

目前以国际期刊发表为主的学术评价体制导致专著的重要性降低。一位台湾资深传播学者曾惊呼：在现有的评

鉴体制之下，几乎没有人愿意从事专著的写作！台湾引入国际论文发表作为学术考核的主要标准，专著既劳神又不计入学术成果，学者纷纷转向符合学术期刊要求的小题目。如此一来，不仅学术视野越来越狭隘，学术共同体内的交流也受到影响。

祖国大陆的国家课题体制还催生了另一种怪现象：有些地方，给钱便可出书。学术专著数量激增，质量却江河日下，造成另一种形式的学术专著贬值。与此同时，以国际期刊发表为标准的学术评估体制亦悄然从理工科渗透进人文社会学科，未来中国的学术专著出版有可能会面临双重窘境。

我们依然认为，学术专著自有其不可替代的价值。其一，它鼓励研究者以更广阔的视野和更深邃的目光审视问题。它能全面系统地提供一个问题的历史语境和来自不同角度的声音，鼓励整体的、联系的宏观思维。其二，和局限于特定学术小圈子的期刊论文不同，专著更像是在学术广场上的开放讨论，有助于不同领域的“外行”一窥门径，促进跨学科、跨领域的横向交流。其三，书籍是最重要的知识保存形式，目前还未有其他真正的替代物能动摇其地位。即使是电子化的书籍，其知识存在形态和组织结构依然保持了章节的传统样式。也许像谷歌这样的搜索引擎或维基百科这样的超链接知识形态在未来发挥的作用会越来越大，但至少到现在为止，书籍仍是最便捷和权威的知识获取方式。如果一位初学者想对某个题目有深入了解，最佳选择仍是入门级的专著而不是论文。专著对于知识和研究范式的传播仍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二是在大量研究者甚至学习者都可以直接阅读英文原文的前提下，学术专著翻译选择与强调的价值便体现出来。

在文献数量激增的今天，更需要建立一种评价体系加以筛选，使学者在有限的的时间里迅速掌握知识的脉络。同时，在大量文献众声喧哗的状态下，对话愈显珍贵。没有交集的自说自话缺乏激励提高的空间。这些翻译过来的文本就像是一个火堆，把取暖的人聚集到一起。我们希冀这些精选出来的文本能引来同好的关注，刺激讨论与批评，形成共同的话语空间。

既然是有所选择，就意味着我们要寻求当下研究中国问题所需要关注的研究对象、范式、理论、方法。传播学著作的翻译可以分成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旨在营造风气，故而注重教材的翻译。第二个阶段目标在于深入理解，故而注重移译经典理论著作。第三个阶段目标在于寻找能激发创新的灵感，故而我们的主要工作是有的放矢地寻找对中国的研究具有启发的典范。

既曰“前沿”，就须不作空言，甚至追求片面的深刻，以求激荡学界的思想。除此以外，本译丛还希望填补国内新闻传播学界现有知识结构上的盲点。比如，过去译介传播学的著作比较多，但新闻学的则相对薄弱；大众传播的多，其他传播形态的比较少；宏大理论多，中层研究和个案研究少；美国的多，欧洲的少；经验性的研究多，其他范式的研究少。总之，我们希望本译丛能起到承前启后的作用。承前，就是在前辈新闻传播译介的基础上，拓宽加深。启后，是希望这些成果能够为中国的新闻传播研究提供新的思路与方法，促进中国的本土新闻传播研究。

正如胡适所说：“译事正未易言。倘不经意为之，将令奇文瑰宝化为粪壤，岂徒唐突西施而已乎？与其译而失真，不如不译。”学术翻译虽然在目前的学术评价体制中算不上研究成果，但稍有疏忽，却可能贻害无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独具慧眼，选择更具有学术热情的中青年学者担任本译丛主力，必将给新闻传播学界带来清新气息。这是一个共同的事业，我们召唤更多的新闻传播学界的青年才俊与中坚力量加入到荐书、译书的队伍中，让有价值的思想由最理想的信差转述。看到自己心仪的作者和理论被更多人了解和讨论，难道不是一件很有成就感的事吗？

推荐序一

“媒介仪式”与“媒介事件”

尼克·库尔德里 (Nick Couldry) 教授的《媒介仪式》一书，以前就有耳闻，但是一直未能完整、认真地阅读全书。在该书中译本即将出版之际，承蒙译者和编辑的信任，托我写点推荐意见，我才有机会较为细致地阅读本书。我自己在既往的研究中零星地思考过一些传媒（或传播）与仪式方面的理论问题。以下文字，是我个人不成熟的一点思考，讲得不对的地方，若库尔德里教授有机会看到，也希望他指出。

因为无法判断这本书在英文学术界中的具体情况，我通过“谷歌学术搜索” (Google Scholar)，查看了几本相关书籍，得到如下结果：截至 2016 年 1 月 18 日，库尔德里的《媒介仪式》一书的引用次数达到 916 次；在同一时间，戴扬和卡茨 (D. Dayan & E. Katz) 的《媒介事件》 (*Media Events*, 1994) 一书的引用次数是 1 979 次，罗滕比勒 (E. W. Rothenbuhler) 的《仪式传播》 (*Ritual Communication: From Everyday Conversation to Mediated Ceremony*, 1998) 的引用次数是 386 次，詹姆斯·凯瑞 (J. W. Carey) 的《作为文化的传播》 (*Communication as Culture, Revised Edition: Essays on Media and Society*, 2008) 的引用次数是 4 106 次。在上述几本讨论传播和仪式的相关书籍中，从谷歌学术搜索显示的

引用情况来看，差别还是较为明显的。尽管这样的结果并不能作为判定学术影响力的唯一标准，但是从这样一种引用情况中，我们也可以从一个侧面看出不同书籍（或作者）在英文学术界的“知名度”。应该说，出版了10余年的《媒介仪式》一书有这么高的引用次数，表明这本书在英文学术界还是有较高的“知名度”的。

上述四本讨论传播和仪式的著述，其实有很大的差别。从成书时间上来看，最早的是詹姆斯·凯瑞的《作为文化的传播》，这是一本论文集，书中的论文大多完成于20世纪70至80年代；戴扬和卡茨的《媒介事件》是一本研究专著，成书于20世纪90年代初；罗滕比勒的《仪式传播》和库尔德里的《媒介仪式》，严格说起来，均是属于“导论”（或概论）性质的，分别成书于20世纪90年代末和21世纪初。凯瑞从文化的视角来讨论传播，提出了两种不同的传播观念，即“传递观”和“仪式观”。戴扬和卡茨“试图引入仪式人类学的理论来阐释大众传播过程”（戴扬、卡茨，2000：2），进而创造了“媒介事件”这样一个概念。“媒介事件”这个概念，已经超出了传统意义上仪式的范畴，它是在传媒介入之后创造出来的一种新的仪式形态。正是在这一点上，戴扬、卡茨和库尔德里有相通之处，库尔德里所说的“媒介仪式”，同样是围绕媒介实践所形成的一种新的仪式形态。至于罗滕比勒的《仪式传播》，则是对传播和仪式进行的一般性讨论，全书由两部分组成，用作者的话来说，即“作为传播的仪式”和“作为仪式的传播”。在他那里，传播和仪式似乎成了可以相互置换的概念。

上述四本书，凯瑞的《作为文化的传播》和罗滕比勒的《仪式传播》勉强可以归为一类，他们从仪式的视角观察传播，看到了一些不同的景致；戴扬、卡茨和库尔德里，同样

是从仪式视角对传播进行讨论，同时他们均聚焦于大众传媒，进而“发现”了一种与传媒相关的新的仪式形态。在这里过多地讲凯瑞和罗滕比勒之间的异同有“偏题”的嫌疑，暂时按下不表，我主要想就戴扬和卡茨的“媒介事件”与库尔德里的“媒介仪式”进行比较。

前面讲到戴扬和卡茨所说的“媒介事件”与库尔德里所说的“媒介仪式”之间有相通之处，两者均是由于传媒的介入所产生的一种新的仪式形态，这样两种新的仪式形态在大众传媒普及之前，是缺少其生产的基础的，也是不可想象的。因此，传播学者这样一种“发现”，对于拓展传播研究的理论视野，丰富社会人类学仪式研究，无疑具有重大的学术意义。但是，戴扬和卡茨所说的“媒介事件”，与库尔德里所讨论的“媒介仪式”，又存在非常大的差别。这两者之间的差别，读者还可以通过进一步比较这两本书来进行归纳，在这里，我只想简单谈两点。

第一，“媒介仪式”并不包括媒介对既有仪式的呈现。戴扬和卡茨所说的“媒介事件”，是指“那些令国人乃至世人屏息驻足的电视直播的历史事件”（戴扬、卡茨，2000：1），戴扬和卡茨早期归纳出的“媒介事件”的三种脚本，其中“加冕”本身就是仪式，“竞赛”和“征服”本身并非仪式，而是由于传媒的介入，使得这两类具有新闻意味的事件具有了仪式的意味。在这三类脚本中，本身就是仪式的“加冕”，应该是库尔德里不感兴趣的。库尔德里在《媒介仪式》一书中这样写道：

在讨论媒介时，对于那种可以被称为“仪式”的“次要”用法，即媒介呈现既有的仪式行为（例如对宗教仪式的电视转播），我也没什么兴趣。（《媒介仪式》中译本，25页）

紧接着，库尔德里教授又这样写道：

很显然，如果我们仅在这种次要意义上使用“媒介仪式”这一术语，那么我们就没必要去探讨“仪式”的根本意义了。（《媒介仪式》中译本，25页）

库尔德里在对“媒介仪式”进行界定时，其实并未讲到这一点。库尔德里对“媒介仪式”的界定是：“媒介仪式是围绕关键的、与媒介相关的类别和边界组织起来的形式化的行为，其表演表达了更广义的与媒介有关的价值，或暗示着与这种价值的联系。”（《媒介仪式》中译本，33页）在本书中给出这个正式的界定之前，库尔德里还对“媒介仪式”做出过一个更简单的界定：“媒介仪式指任何围绕关键的、与媒介相关的类别和边界组织起来的行为。”（《媒介仪式》中译本，2页）由此可见，库尔德里所使用的“媒介仪式”概念，已经超出了狭义的仪式范畴，指向了更为一般性的“形式化的活动”，当然，这种“形式化的活动”是与媒介相关的，并且是重要的。这样一种界定，又直接源于库尔德里对仪式的理解。在《媒介仪式》一书的开头，库尔德里就把人类学对“仪式”的解释归纳为这样三个方面：

（1）习惯性的行为（任何习惯或重复的模式，无论其是否有特殊的意义）。

（2）形式化的行为（例如，在某一文化里对餐桌有规则且有意义的摆放方法）。

（3）涉及某种更广义的价值观的行为（比如圣餐，在基督教中它包含着与终极价值——上帝——直接接触的意味）。（《媒介仪式》中译本，3页）

库尔德里所说的“媒介仪式”，主要涉及上述第二、三方面的意义（或者是两者的结合），他认为“第一种解释没什么

意思”（《媒介仪式》中译本，3页）。

虽然库尔德里的“媒介仪式”概念主要基于上述第二、三个方面的意义，但是库尔德里在后面又把“媒介呈现既有的仪式行为”排除在“媒介仪式”的范畴之外，这多少让人有些难以理解。

第二，库尔德里对“媒介仪式”的讨论是基于一种批判视角的。关于这一点，库尔德里在本书的副标题中已经做了清楚的交代。在《媒介仪式》一书中，库尔德里用了一章（第四章）的篇幅对“媒介事件”进行了反思。在这一章里，库尔德里讲到了“媒介仪式”和“媒介事件”的联系。这段话比较长，但是为了看清库尔德里的思路，直接引用如下。

它（媒介事件，引者注）与“媒介仪式”的联系来自那个总体的行动框架的组织功能，也就是使得发生在很多地点的大量行为聚合起来，并可被称为一个“媒介事件”的这样一种事实或是建构起来的事实（我暂时把这一点放在一边）。这一事实是，通过那个媒介事件的叙事框架，社会的集体属性被确认、强化或者维系。换句话说，媒介事件是一种大规模的、专注于媒介的社会过程，通过对媒介仪式迪尔凯姆式的解读得出的价值或者至少是假想的价值，是这个过程的总体组织框架，通过这一社会过程确认社会凝聚力。所以，在媒介事件的框架下，会发生很多可以被称为“媒介仪式”的本地性行为，因为行为框架把这些行为与媒介展现的价值联系在一起。（《媒介仪式》中译本，67~68页）

在此基础上，库尔德里又这样写道：

尽管戴扬和卡茨的观点具有潜在的国际视野，但是其前提假设在国际层面上越发显得不合理。我们真的能

说任何在一百多个国家播出的公共事件在每一个地点都起到团结社会的效果吗？当然不能。（《媒介仪式》中译本，75页）

因此，库尔德里改写了戴扬和卡茨的论述，他这样写道：

媒介事件展现给我们的不是在媒介里庆祝节日（它们从来不庆祝节日），而是媒介权力在“庆祝节日”。因为，恰恰是在媒介事件这种特殊的情绪化情境里，媒介每天所主张的权力才最有可能被如其所愿地忽略。（《媒介仪式》中译本，79~80页）

库尔德里从“媒介仪式”与“媒介事件”的关联讲起进而到了改写戴扬和卡茨的论述，简单说来，戴扬和卡茨遵循的是一种建构的视角，而库尔德里所采取的是一种批判视角。这样的批判是否公允？有待商榷。

在我看来，上述两点，是彰显库尔德里的“媒介仪式”与戴扬、卡茨的“媒介事件”区别的两个最主要的方面。在此，我也不想再做展开说明，以上个人观点若能起到抛砖引玉的效果，那是最好。

在我自己既往的研究中，也曾讲到过另一种“媒介仪式”（郭建斌，2012；2014），我所说的“媒介仪式”和库尔德里教授在本书中所说的“媒介仪式”完全不同。因此，在阅读库尔德里的《媒介仪式》一书时，对于他把“媒介呈现既有仪式行为”排除在“媒介仪式”之外，我还是心存疑惑。那些由媒介呈现出来的既往仪式与没有媒介参与的仪式之间到底有着怎样的差别？媒介对于既往仪式的呈现难道真的不值得关注？这样一些问题，我想另找机会再做讨论。

库尔德里的《媒介仪式》一书的翻译、出版，肯定会给中文传播研究带来一些新鲜的学术话语资源，如同当年戴扬

和卡茨的《媒介事件》和詹姆斯·凯瑞的《作为文化的传播》的中译本的问世。在当下中国，库尔德里所说的那种围绕媒介而生发出的“对中心的迷思”，以及对媒介内容生产地的“朝觐”，等等，已经有较为具体的观察对象。对于这样一些现象，沿着库尔德里所提供的理论视角，是可以做出精彩的研究的。

但是，媒介（或传播）与仪式研究作为一个传播学、人类学等交叉学科的新兴研究领域，库尔德里的观点并非完全无懈可击，甚至还存在一些难以自洽的地方。世界那么大，不要奢望任何一个理论能够解释所有的问题，对现实进行深入的体察，不同理论话语之间相互碰撞，对具有现实意义的问题做出理论性的回答，这是任何社会科学研究的不二法则。同时，正如我在前面讲到的，这样一本“导论”（或概论）性质的书所做的一般性讨论，还需结合具体的现象进行更为深入的探讨，而不能把它们作为重要的理论结论来对待。

郭建斌

（云南大学新闻学院教授、传播与民族文化研究所所长）

2016年1月20日初稿

2016年2月6日修订

参考文献

[美] 丹尼尔·戴扬，伊莱休·卡茨．媒介事件 [M]．麻争旗，译．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0．

郭建斌．媒介仪式中的“家—国”重构与游离：基于中国西南一个少数民族村庄田野调查的讨论 [J]．开放时代，2012（5）．

郭建斌．如何理解“媒介事件”和“传播仪式观”：兼评

《媒介事件》和《作为文化的传播》[J]. 国际新闻界, 2014

(4).

[美] 詹姆斯·W·凯瑞. 作为文化的传播 [M]. 丁未,

译. 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05.

Rothenbuhler E W. Ritual communication: from every-

day conversation to mediated ceremony [M]. Sage Publica-

tions, 1998.

推荐序二

媒介如何影响大众：媒介权力构建的重识

如今，上下班的路上人们捧着手机或 Pad 已经是常见现象。我国网民规模已经达到 7.1 亿，而移动互联网网民数量也达到了惊人的 6.56 亿。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被媒体包围的世界中，我们的所见、所知、所想都深深地受到这些媒体所传递的信息的影响。就此，自媒体人罗振宇在他 2016 年 1 月的跨年演讲中提出这样一个观点：“我们看到的最热闹的新闻，其实未必塑造了这个世界真相。”让我们来看几个有趣的例子：Space X 发射火箭起火爆炸一事搞得沸沸扬扬，而我国研制的全球首颗量子科学实验卫星“墨子号”发射成功却少有关注；王健林大量进行海外投资鲜为人知，而《鲁豫有约》中“一个亿的小目标”却让他一炮而红；抢了巴西奥运会头条的王宝强离婚案持续发酵，而《英汉大词典》译者陆谷孙过世的报道却转瞬即逝。这些再次印证了在多元的世界中，媒体只会选取部分的事实予以呈现，从而为公众塑造出扭曲甚至虚拟的“真实”。令人疑惑的是：我们为何会对媒体“塑造”的“真实”深信不疑？其实关于真实、媒介权力等，在学界已经有了很多探讨，但是《媒介仪式》（*Media Rituals: A Critical Approach*）这本书，将会从一个更新的视角来审视这些问题：媒介是如何塑造媒介化社会中心，并

将其社会中心代言人的身份自然化、合法化的。

《媒介仪式》成书于2003年，正值电视传媒发展的鼎盛末期，作者尼克·库尔德里（Nick Couldry，笔者曾译为尼克·寇德瑞）以敏锐的学者视角，洞悉到了电视媒介权力背后的神秘力量。而在电视传媒逐渐衰落，移动互联网全面改变着社会传播结构的今天，我们仍然能够从这本书中得到启示，它所提供的探究媒介权力变化本质问题的思路和方法，对于我们进行媒体产业和发展趋势研究有着另一番借鉴意义。

一、尼克·库尔德里的仪式观

仪式理论研究起源于19世纪，在20世纪70年代被引入传播学领域。在该领域的研究过程中，此前的学者提出了“仪式”、“传播的仪式观”、“媒介事件”等概念。在总结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尼克·库尔德里提出了“媒介仪式”这个概念，并阐明其核心观点：现代社会是被媒介系统所渗透和制约的“媒介化”社会，媒介通过对社会中心的塑造和表达，构建起其社会中心代言人的地位，而权力构建过程则通过媒介仪式变得隐蔽化和合法化。尼克·库尔德里的论述解答了媒介在建立日常生活秩序、塑造社会结构方面扮演着何种角色，以及媒介作为社会存在如何与人们的生活实践产生紧密关联等问题。

在对“仪式”的认识上，库尔德里颠覆了长久以来涂尔干主义的研究路径，他在书中明确提出，“要解释媒介仪式性的一面，必须颠覆涂尔干的解读……关键的不是‘仪式’一词所昭示的什么古代的东西……而是一种……本质的东西：权力和社会组织大规模的集中化”。这一论述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高维的分析方法，以对传播活动和仪式活动进行抽象：传播活动和仪式活动的本质是“权力和社会组织大规模的集中化”的问题，也就是“符号资源”和“社会调和”的问题。